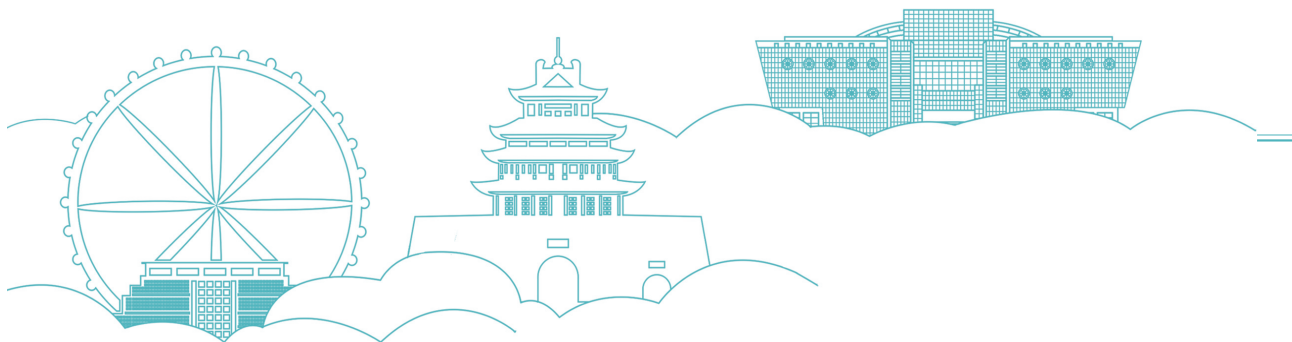




以文脉传承激发“两河明珠”城市活力

■ 杨增晖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城市文脉的赓续,本质上是在具体社会历史实践中不断生成、调适、确证文化主体性的活态过程。一座城市拥有自身文化主体性的现代化,是确保城市文明自身文化认同的前提;唯有以独立自持的文化价值赋予城市民族文化与地方文化特色,才能以鲜明的文化主体性有力推进文化自信。

聊城作为黄河与大运河唯一实质性交汇城市,千年运河蜿蜒绕城,元代、明代运河遗址遗存完好,临清运河钞关留存着明清漕运商贸的繁华记忆,山陕会馆承载着晋鲁商贸文明与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挖掘梳理这些珍贵的文化资源,就是守护城市的文化主体性。全市宣传部长会议明确提出,要推动文化“两创”取得更多成果,全面加强文化遗产保护。近年来,聊城系统梳理城市历史发展脉络,深入挖掘文化遗产蕴含的哲学思想与人文精神,海源

阁古籍“归阁工程”取得重要进展,让流散百年的珍稀典籍以数字形式“归来”。聊城正在让千年文脉从故纸堆走向大众,从历史走进现实。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其精神内涵的传承与弘扬。聊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开放包容、崇文尚德、自强不息等精神品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是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的宝贵资源。在实践中,聊城将“孝亲”“诚信”等传统德目进行时代化阐释,如临清开办“运河家长大讲堂”,在平社区大学将剪纸非遗与家风课堂结合等,使文化精神从典籍走进日常。当文化倡导转化为可量化、可激励的行为规范,社会文明提升便从外在要求变为内在自觉。文化的力量润物无声,以传统美德涵养城市品格,以文化自觉培育文明风尚,聊城正在让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的内在动力。

保护是利用的前提,利用是保护的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重视保护城市独特的历史文脉、人文地理、自然景观”。这为新时代在城市发展中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求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统筹好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聊城坚持保护优先、修旧如旧,立足珍贵历史遗存,守住城市文化根脉。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聊城段)建设稳步推进,东昌湖、徒骇河等重点水系串珠成链;米市街历史街区修旧如旧,实现了从“静态保护”向“活力运营”的转变。以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塑造城市特色标识,聊城走出一条文化有厚度、发展有速度、民生有温度的特色融合之路。

(2026年度全面依法治市调研课题《聊城法治文化资源融入城市精神的培育路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孔繁森精神赋能莘县文化发展研究

■ 虞莹莹

1981年至1985年,孔繁森同志在莘县担任县委副书记。这四年,是他从高原回到平原后继续深耕基层一线的四,也是其精神从初步形成走向成熟的重要阶段。在莘县工作期间,他躬身实践的公仆情怀、推动马西林场生态治理的使命担当、与西藏战友跨越地域的精神纽带,构成了孔繁森精神在莘县最鲜活的实践烙印。这些实践经历不仅是莘县宝贵的红色文化记忆,更是不可复制的文化资本。

从学理逻辑上看,孔繁森精神赋能莘县文化发展,遵循“精神—文化—治理”的三重转化逻辑。首先,要将无形的精神内涵通过阵地、作品等形式符号化,转化为可感知的文化资源;其次,推动文化资源进入产业循环,与文旅、文创等业态融合,形成“红色资源—文旅体验—经济转化”的可持续发展通路;最后,将文化效能融入基层党建、社区治理和乡风文明建设,实现文化发展与治理提升的良性互动。

近年来,莘县在红色文化传承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修复提升革命旧址13处,打造了纵贯全县南北80公里的“平原红色文化长廊”,建成了孔繁森同志在莘县事迹陈列馆,挖掘本土

非遗代表性项目218个。但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来看,文化传承仍存在一些结构性困境。

一是文化资本的符号化转化不充分。当前传承主要依托陈列馆参观和党课教育,展陈方式偏重静态图文,孔繁森在莘县期间躬身实践、生态治理等生动实践尚未被系统性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的文化符号产品,互动性和体验感不足。二是文化资源的产业化整合不深入。孔繁森精神与莘县非遗、农耕文化、乡土文化的融合尚处于起步阶段。马西林场生态文化园与事迹陈列馆之间的联动不够紧密,红色文化资源向产业动能转化的路径较为单一。三是文化品牌的系统化建构不完善。孔繁森精神作为莘县标识性的红色文化IP,其品牌效应尚未充分释放。传播渠道和方式相对传统,在年轻群体中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有待增强,文化价值向发展优势的转化还不够充分。

将孔繁森精神融入莘县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必须突破传统党性教育模式,构建“精神传承+文化活化+文旅融合+群众参与”的全链条发展体系。一方面,要强化阵地建设与产业融合。以孔繁森同志在莘县事迹陈列馆为核心,

整合马西林场等13处场馆构建“一核多点”矩阵,推动展陈从“静态陈列”向“动态体验”转变。依托“繁森故里石榴红”品牌策划“孔繁森精神文化节”,开发“重走繁森路”研学线路。将孔繁森精神融入山东琴书、剪纸等非遗技艺,开发“繁森故里”系列文创产品。以“红绿蓝”三色文旅格局为基础,在红色维度丰富研学产品,绿色维度融入马西林场生态建设,蓝色维度依托高铁实施“引客入莘”计划,在桃花节、西瓜节等节庆中实现多元业态融合。

另一方面,要深化数字赋能与全域协同。建设孔繁森精神数字资源库,抢救性采集老干部口述史料,开发VR/AR体验产品,运用AI技术修复历史影像,制作年轻群体喜爱的短视频、动漫等数字产品。同时,将孔繁森精神纳入干部教育、国民教育和基层宣讲体系,组织“我讲孔书记的故事”群众宣讲活动。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将精神传承有效嵌入社区治理与乡风文明建设,实现精神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双向赋能。

(聊城市社科规划课题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ZXKT2026077)

推动聊城地方红色资源融入高中历史教学

■ 方东旭

新课标要求历史教学挖掘本土红色资源,涵养家国情怀。聊城作为冀鲁豫平原抗日根据地核心腹地,红色资源丰富,与高中历史编教材高度适配。如何让“身边的历史”走进课堂,值得深入探索。

聊城是晋西红色革命发源地。从1926年阳谷九都桥鲁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到1935年在莘县徐庄重建山东省委;从成立莘县红庙中共冀鲁豫(平原)分局驻地,到阳谷沙河崖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指挥部;从金方昌、马本斋到孔繁森,红色资源覆盖建党、土地革命、抗战、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和新时代。全市有2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16处省级党史教育基地、近20处烈士陵园,与教材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单元高度匹配。尤其是冀鲁豫根据地作为全国最大平原抗日根据地,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山地根据地不具备的独特史料。

调研聊城6所公办高中、320名学生和18名教师发现:89%的教师未系统整理本地红色史料,多数仅零散知晓孔繁森同志纪念馆;课

堂多在结尾简单提及本地英雄,缺少史料研读、辩论、项目式学习;红色研学常沦为拍照打卡,76%学生研学后无探究报告;馆校缺少固定合作;评价仍以纸笔考试为主,红色成果难计入综合评价;部分教师对冀鲁豫边区革命史知识储备不足。

针对上述问题,可构建“五位一体”的深度融合路径。一是课堂嵌入式教学。课前5分钟用烈士书信、老照片创设情境;课中20分钟“全国通用史料+聊城本地史料”对照研读;课后分层作业。讲《全民族抗战》,可从金方昌狱中血书导入,讨论“平原无险可守,根据地靠什么坚持”。二是分年级分层实践。高一就近参观烈士陵园,与教材红色展厅,填写学习单;高二赴中共冀鲁豫(平原)分局旧址等地研学,完成史料分析报告;高三开展“聊城百年红色发展变迁”项目式学习,进行口述采访、主题征文。三是共建数字化资源库。联合党史研究院、文旅局和高中教研组,建设史料素材库、微视频库、VR虚拟研学板块,编写《聊城红色史料与高中历史对接读本》。四

是建立馆校长效合作。学校与纪念馆签订实践基地协议,固定研学时段;讲解员进校讲党史,教师进馆备课;联合开发标准化研学任务单,杜绝观光式参观。五是构建多元评价机制。过程评价占40%,纸笔测试占60%,红色研讨、研学报告、征文计入平时成绩;试卷适度引入聊城红色史料分析题;红色校本课程、公开课纳入教师教研考核。

各项举措要落地见效,还需要配套机制保障。市区教研室应组织教师专项培训,邀请党史专家授课,安排赴红色基地研学;学校设立红色实践专项经费,教育部门明确每学期红色课堂和实践频次;通过家长会、班级群争取家长支持,倡导节假日家庭红色打卡。未来可探索历史、语文、政治跨学科融合,开发AI虚拟红色研学。

聊城红色资源不是课堂点缀,而是立德树人的鲜活教材。把家乡百年奋斗史讲深讲活,才能让学生知史爱党、知史爱乡、知史爱国。

(聊城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项课题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ZXKT2026352)

和合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共鸣

■ 王泽天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团结与分裂、机遇与挑战相互激荡,“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成为时代之问。面对这一根本性追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深刻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时代课题。这一理念的思想伟力,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滋养。其中,和合思想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基因,所蕴含的和而不同的差异观、协和万邦的交往观、天人合一的共生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思想共鸣。二者在回应个体与共同体、差异与统一等根本性问题上形成深刻的思想共鸣,并通过全球治理倡议等路径不断从理论走向实践。

和合思想的核心要义在于和而不同,这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处理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寻求和谐共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这一思想的当代呈现;它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发

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区别于西方文明冲突论的哲学底色。

从协和万邦到和合共生,和合思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处理差异与统一关系的辩证智慧。和合理念的深刻之处在于,它不追求消除差异的“同”,而是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合”。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人类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这一论述超越了零和博弈的传统逻辑,确立了和合共生的对立统一思维;打破了赢者通吃的争霸之道,确立了互利合作的共赢之道。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差异不再是合作的障碍,而是对话的基础和创新的源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倡导的,正是在尊重差异中凝聚共识,在包容多样中实现共同发展。

和合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共鸣,不止于理论层面的价值契合,更在实践不断得到印证和深化。从“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到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

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的系统推进,都贯穿着和合理念的精神内核。由此可见,中国正将和合的文化基因转化为参与全球治理的实际行动,和合思想所蕴含的智慧不仅属于中国,也为人类共同面对全球性挑战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从和而不同到和合共生,从协和万邦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之间形成了一条清晰的思想脉络。这条脉络的核心,是对“如何在一个差异世界中寻求共同生活”这一根本问题的中国式回答。和合思想所蕴含的包容性、和平性与共生性,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权力政治”的思维窠臼,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提供了深层的文化支撑和价值引领。和合的东方智慧正在当代全球治理中焕发新的生命力,它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重要的价值指引与行动理路。

(聊城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项课题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ZXKT2026168)

地方红色资源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素材库,但其育人价值的实现并非自然发生,而是一个从“历史记忆”向“育人动能”创造性转化的过程。北杨集七烈士英雄事迹作为聊城最具标识性的地方红色资源之一,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典型案例。

以北杨集七烈士英雄事迹为代表的地方性红色资源,具有独特的育人优势,可概括为“在地性”的三重意涵。

空间上的邻近性。北杨集七烈士纪念馆位于开发区北城街道北杨集村,距离本地高校不过数十公里。学生可在日常教学安排中完成参观,使红色教育实现常态化。情感上的可及性。烈士就长眠于学生生活附近的村镇,烈士后人可能就住在邻村。当学生听到烈士后人翟瑞祺讲述祖父翟修安被捕时的故事,看到1947年村民自发捐款修建的烈士亭时,这些场景所激发的情感共鸣远胜于课堂上的抽象说教。身份上的认同性。地方红色资源讲述的是“我们这块土地上发生的故事”,这种乡土归属感使学生意识到,英雄精神并非遥不可及,而是生长在自己脚下的土地上。

目前,关于北杨集七烈士的记载散见于沈廷梅《北杨集七烈士》回忆录、烈士亭碑文、地方媒体报道之中,本次研究系统地整理了相关史料,求证了事迹中的细节,还原了历史。1937年,中共地下党组织派袁本恒到北杨集村秘密开展工作,建立了以赵春华同志为首的中共地下中心支部。1940年4月2日,日伪军突然包围北杨集村,赵春华、赵春潮、翟修安、王宪伦、张子杰、翟林臣、耿玉明七位同志被捕,面对严酷的生死考验无一人叛变,最终英勇就义。

七烈士面对的是生死考验,和平安代的高职学生不可能也不需要复制这种牺牲。转化的关键在于找到“同构关系”:烈士的“忠诚”可转化为对职业承诺的坚守,烈士的“坚韧”可转化为技能训练中的耐心与抗压能力,这种“降维转化”使英雄精神从遥不可及的道德高标变成人人可学的行为指南。结合高职学生职业导向,本课题提出了四维实践路径。

课程思政嵌入。在思政课上,将翟修安“以公事为已事”的故事作为“廉洁奉公”典型案例;在专业课中,将七烈士坚韧不屈的精神与“工匠精神”进行对照讨论,实现红色精神与职业素养的有机融合。

“行走的思政课”实践教学闭环。设计“行前预习—现场体验—返程讨论—课后作业”完整闭环,纳入思政课实践学分管理。行前预习要求学生建立基本认知;现场体验安排参观展厅、祭扫仪式;返程讨论组织情境思辨;课后作业要求学生撰写反思日志或创作数字化作品。

数字化共创。鼓励学生成为数字化创作主体,拍摄、剪辑、讲述七烈士故事,这一创作过程本身即是最深刻的教育。《红七月·我在这里》短视频的获奖已证明数字化是红色教育实现青年群体“破圈”传播的有效路径。

构建校地协同育人共同体。与北杨集红色记忆馆签订共建协议并挂牌“大学生红色教育实践基地”,定期组织学生担任义务讲解员、参与史料整理与展陈维护,既缓解场馆人手不足的困难,又为学生提供实践锻炼机会。

当英雄的故事由教科书中的符号变为学生可以触摸、可以对话的真实人物,当英雄的精神从遥不可及的道德高标变成学生日常可践行的行为准则,地方红色资源才真正完成了从“历史记忆”到“育人动能”的创造性转化。这一逻辑不仅适用于北杨集七烈士,也为其他地区利用本土红色资源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路径。

(聊城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项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编号:ZXKT2026324)

明清运河沿线城市译者人员构成及地理分布

■ 朱鸿祥

明清时期,贡使进京、西洋传教士东来以及西域商人往来等大都离不开大运河水路交通。运河在贯通南北的同时,也串起一条翻译带,彼时语言融通全靠译者翻译,译者随漕船、贡舶、驿路而行,这种流动性形成独特的运河线性译者带。

在这条译者带上,明清时期的译者主要由五类群体构成,即国家口笔译员、使团随团译官、西方传教士、本土士大夫、商贸民间通事,并且形成四种翻译模式,即制度内口笔译、使团译事、中西协作译述、市场驱动的民间语言服务。制度内口笔译由国家专职笔译和口译人员组成,多集中于北京。永乐五年(1407年),明成祖设四夷馆,遴选国子监生分习八国语文;清代改四译馆、会同四译馆。藩文表章笔译多出自四夷馆或四译馆,口译活动则由会同馆国别通事与通官负责。使团译事由来自朝鲜、琉球、安南、暹罗、日本的通事负责,使团通事全线流动,病逝或者安葬节点集中于通州张家湾、德州、淮安。中西协作译述由传教士译者和本土士大夫协作完成,传教士译者代表人物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金尼阁等,士大夫合译者则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市场驱动的民间语言服务多为商贸民间翻译,译者包括盐商账房通事、盐关税吏、私盐交易中间人、漕船带货商客等,主要进行跨地域和跨语种的商务口译、盐务税务文书、交易撮合与官府打点。

由此可见,国家译馆制度、朝贡通道组织、西学知识网络与民间商贸服务体系共同构成了“一轴多珠、北源南网”的廊道集聚译者带。据统计,在149位译者中,京津译者有57人,占比最高,中段五城(沧州—德州—聊城—济宁—徐州)合计33人,江南段合计59人,形成与北京匹敌的次密集区。译者分布以运河为轴呈带状延展,以节点城市为“珠”分级串联,以北京为制度之源,以江南为协作之网,形成制度与协作双核驱动,塑造出“北端制度集聚,沿线节点分布,江南协作密集”的三层译者地理线性运河翻译带。国家漕运与朝贡体制构成译者集聚特征的背景条件,京师译馆制度化、沿线驿站使团化、江南士人与传教士协作化是译者集聚的具体内容,最终塑造出独特的廊道集聚译者带。

明清时期运河沿线城市译者的地理分布是当时国家与地方、经济与政治的客观反映。漕运、盐业、税收、民俗之外,语言与知识的传递亦是大运河文明互鉴的重要内容。这段发生于内陆河网而非海岸线的翻译叙事,这种不同于点状分布的译者集聚形态,对于构建本土翻译史话语和讲好运河故事具有重要作用。而这条随漕运而生而亡的翻译带,亦需要后人循着墓与碑,读出这条河曾经如何述说中国故事。

(聊城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编号:ZXKT2026217)

地方红色资源的思政育人价值转化研究

——以北杨集七烈士纪念馆为例

■ 郭玉娟
陈鑫

理论

周刊

十版

2026年10月22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 邹越 美术编辑 / 辛政 校对 / 宋春芳

观策

